

主編的話

在 2022 年 8 月 24 至 26 日舉行的「教廷傳信部自 1622 年以來打開的大門」國際學術研討會中，福音傳播部副部長塔格萊樞機（Luis Antonio Tagle）在主題演講中指出：「福音傳播或宣布喜訊的中心是耶穌基督本人。」

教宗方濟各在其關於羅馬教廷改革的宗座憲章《你們去宣講福音》（*Predicatum Evangelium*）中，將耶穌託付給門徒的這一使命視為「教會在現代世界中可以為每個人和全人類提供的主要服務。」

塔格萊樞機在演講中提出了一個問題：作為耶穌身體的教會，是否仍然依靠耶穌和祂的福音在現代世界充滿活力的臨在而繼續著？教會必須不斷地接受耶穌傳播的福音，才能繼續對人們顯出其美麗和吸引力。因此，不斷的牧靈皈依至關重要。

傳信部四百年前的誕生，旨在消除保教權的負面影響，即殖民列強和傳教士的出現兩者之間的關聯，這影響仍然在已信和未信福音的國家或傳教區的思維模式中產生作用。如今，由於移民、社會傳播和文化交流帶動了人口的移動和思想的改變，「派遣國」和「傳教區」這些地理邊界和空間已經變得流動。

傳信部，後來更名為萬民福音傳播部，現已改革為福音傳播部，其中一個部門負責向世界福傳的基本問題，另一個部門負責在其管轄地區內的初傳和新地方會。每個受洗者都是需要不斷被福音轉化的福音傳播者。他們必須在共融的精神之中生活。每個教會都被召叫去傳教，她同時給予和接受。每個教會都必須體現在基督內，不論其政治、社會或文化背景為何。

塔格萊樞機提醒我們，梵二會議已經注意到社會傳播是傳福音的機會。社交媒體不只是一種溝通手段，它本身已經成為了一個世界、一個生態系統。作為一個世界，我們需要向它傳福音，以保持真正的溝通和團體的真實性。社交媒體和人工智能（AI）正在悄悄地重新定義或重塑人類。樞機問自己：人是甚麼？

塔格萊樞機邀請我們向身為亞洲人的耶穌學習，以應對今天和未來在福傳上的挑戰和機會。

經過同儕評審，這次為期三天的線上研討會有十一篇論文收在本期的《天主教研究學刊》。

三篇論文回顧了在亞洲的傳教歷史，特別是韓籍傳教士金學玄神父（Fr. Michael Hak-Hyeon Kim, KMS）題為〈從使命到傳教：韓國天主教會的傳教經驗〉，講論韓國天主教會的獨特傳教經驗。印尼遣使會方濟各·阿瑪達神父（Fr. Francis X. Eko Armada Riyanto, CM）論述〈傳信部與天主教在印尼的傳教〉的歷史，柯蘭霓教授（Claudia von Collani）描繪了一段〈磕磕絆絆的開始——傳信部與中國建立關係的初期嘗試〉的歷史。來自不同修會團體的在華傳教士與傳信部產生一些衝突，最終引發了中國禮儀之爭，而多羅主教（Charles-Thomas Maillard de Tournon，1707年成為樞機）領導的宗座使團未能解決這一問題。

有五篇論文是關注社交媒體：現代世界的傳播。李立峯教授在其論文〈社交媒體時代傳播的挑戰：媒體研究的視角〉中評估了迴聲室效應和假新聞的問題。這兩個問題的背後都是對人們跨越差異的溝通能力，以及解決衝突的能力的關注。林瑞琪教授反思天主教會在數碼社交媒體時代的角色，而朱珩甄博士則從數碼神學的觀點審視二十一世紀基督教會的福傳。還有兩位在天主教社會傳播方面經驗豐富的神父：米申神父在他的論文〈傳播與教會〉中詳細闡述了天主教神學中三位一體的通傳、共融和團體。米神父被問到是否有可能像佛教一樣，在心靈之間傳達基督徒信仰，而無需語言或溝通方式。在他的回應中，米神父強調了天主教傳播模式中三個要素（發送者、訊息和接收者）的同一性，以及天主教的默想和默觀的傳統。宗座外方傳教會的貝納德神父（Fr. Bernardo Cervellera）從西方歷史的角度探討了他的主題〈傳信部及作為傳播的使命〉。

最後，三篇論文涉及東西方在文化交流中的相遇。學愚教授在其論文〈重構美國的靜觀默想〉展示了多年來亞洲不同的佛教傳統如何在美國扎根。它們中有些在與西方科學相遇後重新融入情境，並在美國中產階級和學術界發展成靜觀默想。宗座外方傳教會柯毅霖教授（Fr. Gianni Criveller）在

他論文〈一個世紀不連貫的傳教政策。傳信部與中國：從遷就命令（1659 年指示）到對中國禮儀的譴責（1742 年）〉分析了傳信部的文化局限性和不連貫的傳教政策，這對中歐之間的互動產生了持久的影響。耶穌會梅謙立教授（Fr. Thierry Meynard）在其論文〈在民國初期天主教推動本地化：傳信部在廣州的作用〉中，強調了首任駐華宗座代表剛恆毅總主教（Celso Costantini）及其屬於巴黎外方傳教會的導師、後來擔任廣州總主教的宗座代牧魏暢茂（Anthony Fourquet）的重要作用。

譚永亮神父